

〔美〕亨廷顿 (S.P.Huntington) 张 铭 谢 岳译 周士琳校

(编者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关注。我国一些报刊曾以不同篇幅先后介绍过该文。现本刊较为详尽地发表该文的译文,并将刊载对该文的评述,以飨读者。

冲突的下一个类型

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未来走向学者们见仁见智——历史的终结;回归于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国家在部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张力作用下衰落等等。这些见解虽然都抓住了某些现实,但却忽略了全球政治今后走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方面。

我的见解是,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文明间的冲突是现代世界冲突发展的最新阶段。以往发生在诸侯、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间的那些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越过了自身的西方阶段,其核心部分已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明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而是连接西方的历史发动机和塑造者。

文明的本质

冷战期间,世界曾被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世界。这种分法如今已经过时,以文化和文明划分这些国家集团远比以政治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划分有意义。

我们讲的文明指的是什么呢?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村落、地区、种族集团、国籍、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差异的不同层面有着独特的文化。文明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人们所具有的最广

义层面的文化身份是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标志。文明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文明包容的人们和国家可多(如中国)可少(如加勒比人中的亲英分子)。文明显然可以是混合与重叠的,可以包括某些亚文明。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它们间的界限虽不显眼但是真实的。文明是动态的,他们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和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

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成是全球事务的主角,但这实际上不过是晚近几个世纪的事情。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确认了21种主要的文明,其中只有6种文明留存了下来。

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人们的文明身份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还是基本的差异。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和最重要的宗教而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既对权利和义务、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的关系上何者更重要有分歧,也在神人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市民与国家关系、双亲和孩子关系、夫妇关系等方面持不同看法。这些差异作为历史的积淀非短期所能消除,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间的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

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然而,许多世纪以来,文明的差异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冲突的导因。

第二,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

第三,遍及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使人们游离于长期的地方特性,削弱了作为身份来源的民族国家,许多世界性宗教常以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形式填补缺口。在许多国家和宗教中热衷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为年青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产阶级技术人员、专业人士和商人。韦格尔(G.Weigel)指出,“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后期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充满敌意的宗教竞争为跨国界的文明认同和协调提供了方便”。

第四,文明意识由于西方的双重作用而得到强化。一方面,西方处于力量的顶峰,而与此同时或作为其结果,非西方文明中的寻根现象层出不穷。西方正面对非西方社会增长着的比非西方方式建构世界的渴求、意志和智慧。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通常都是最倾向西方的人们,但现在却完全相反。一批非西方化的本土精英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方式和习俗流行于非西方国家的同时脱颖而出。

第五,文化的特征和差异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因而比政治、经济特征和差异更难协调和变更。在原苏联,共产党人可以变为民主主义者,富人可以变为穷人,反之亦然,但是俄罗斯人不可能变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可能成为阿美尼亚人。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关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这是既定的、不能改变的。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答错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头上中弹。比种族区别更激烈更具排他性的是宗教差别,一个人可以是混血儿,也可以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却绝不可能成为半天主教徒和半穆斯林。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抬头。从1980年到1989年,地区内的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百分比不

断上升,欧洲从51%上升到59%,东亚从33%上升为37%,北亚从32%上升到36%。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还会不断增强。经济区域主义的成功一方面会加强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它也只有扎根在文明共同体中才会有所成就。文化和宗教构成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共同的文化非常明显地大大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及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团的经济高速发展。

正如人们以种族、宗教关系确认身份一样,他们很喜欢在自身与他种族、他宗教的人们间发现那种“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文化和宗教差异造成了从人权、移民、环境到贸易等一系列政策问题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军事、经济利益优势地位而积极地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予以推广,这激起了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而政府和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动员支持、结盟能力的下降,也会刺激他们诉诸共同的宗教和文明身份以获取支持。

文明的冲突由此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在微观上,在文明断裂带上相邻的集团为控制领土和对方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在宏观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军事、经济权力而竞争,为控制国际机构组织而斗争,竞相推行他们特定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

文明间的断裂带

文明间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随着欧洲意识形态分裂的消失,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的文化分裂在欧洲已重新出现。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如华莱士(W.Wallace)所讲,可能是公元1500年西方基督教的东部边界线。这条界线就是眼下芬兰、巴尔干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它南下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天主教的西乌克兰与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分开,然后折向西,把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余部分隔开,再经过南斯拉夫,几乎正好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与南斯拉夫其余地方分开。在巴尔干的这条分界线又恰恰和哈布斯堡与奥斯曼这两个王朝的历史边界相吻合。今天,文化的“丝绒幕”已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

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南斯拉夫事件已表明,这不仅是一条差异线,而且也是眼下血腥冲突的战线。

沿西方与伊斯兰两种文明间断裂带的冲突延续了1300多年,他们之间的军事、文化对抗不仅不会消退,甚至还可能愈演愈烈。阿克伯(M. J. Akber)预言,西方面临的“下一个对抗”肯定将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确,在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一大批伊斯兰国家中,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斗争已经开始。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面对的另一场历史性大对抗是和异教徒、多神论者展开的。目前它所针对的是南方日益增多的基督教黑人,这种对抗在多场正在进行中的内战中得到体现。随着非洲的现代化以及基督教的传播,这类暴力冲突无疑会沿断裂带进一步加剧。在伊斯兰的北疆,穆斯林与东正教徒间的冲突频频爆发,它包括巴尔干冲突、奥塞梯与印古什的暴力争斗、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不断地相互残杀、俄罗斯与中亚穆斯林关系的紧张以及利用俄军保护在高加索和中亚的俄罗斯人利益。

文明的冲突深深扎根在亚洲各地。在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历史冲突现在不仅表现为印巴之争,而且还表现为印度内部不断加剧的宗教斗争。在东亚,中国与许多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发生争执,在少数民族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遇有难题。随着冷战结束,中美两国间原先潜伏着根本差异在诸如人权、贸易、武器扩散等方面再度紧张。与此相应,美日间的关系也越益麻烦,文化差异加剧了经济冲突。

文明间相互作用在使用暴力的倾向上有很大的差异。美欧这两大西方次文明间以及美日间占主导地位的冲突形式显然是经济竞争。但在欧亚大陆,以极端的“种族清洗”为缩影的种族冲突扩散并激化,总的来讲不是偶然的,这里,分属不同文明的集团间冲突极为频繁和严酷。文明间巨大的历史断裂带在欧亚的再度燃烧突出地表现在沿着从非洲突出部到中亚的新月形的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上。以伊斯兰为一方的暴力冲突正发生在他们与以色列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以及菲律宾的天主教徒的斗争中,伊斯兰有着一血淋淋的边界。

文明聚合: 亲缘国家征群

当某一文明内的集团或国家与其他文明中的人们开战时,它自然会期盼得到同一文明内部其他成员的支持。随着后冷战世界发展出如格林韦(H. C. S. Greenway)所谓的“亲缘国家征群”(Kin-Country Syndrome),即文明共同体正在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作为合作、结盟基础的传统力量均势考虑,这种倾向在海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等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中逐步显现出来。虽然这些冲突还不是文明间的全面战争,但都有文明聚合现象出现其中,这种倾向还会随冲突的延续而发展,并可能会被未来援为成例。

首先,虽然只有少数穆斯林政府在海湾战争中完全支持萨达姆,但有很多阿拉伯精英在私底下为他喝彩,大多数阿拉伯公众也很拥戴他。伊拉克还得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普遍支持。萨达姆及其支持者力图把这场战争说成为文明间的战争。其次,亲缘国家征群还在前苏联的冲突中表现出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争斗后来分别得到了来自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支持。再次,在前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西方公众虽然对波黑穆斯林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对克罗地亚向它发动的进攻及肢解行为却很少关注。而在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时,德国、梵蒂冈奔走于前,欧共体、美国相随在后,西方文明主要成员在共同宗教之下聚合在一起。在另一个方面,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向波黑穆斯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来自20个伊斯兰国家的4000名穆斯林在1993年参加了波斯尼亚内战。

文明的聚合在过去受到抑制,但现在却获得了加强,它在将来显然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冲突的延续,民族国家的位置及它们间的分裂将沿着文明断裂带进行。民粹主义政治家、宗教领袖和传播媒介已发现,在唤起公众支持和向犹疑不决的政府施加压力方面,文明聚向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在未来的年代里,文明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未完待续)

(摘自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